

秦汉驿的职能考述

高 荣

(河西学院历史系,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 要: 秦汉的驿是为方便公务往来、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而设的官方组织。遍布各地的驿, 在为朝廷使者、戍边将领和各种公务往来者提供车马服务的同时, 还直接从事公文和信息传递, 为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畅通, 维护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秦汉; 邮驿; 驿使; 驿马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09)04-0001-05

驿具有传递信息、运送物资和便利使者、官员往来的功能, 因而人们往往将邮、驿、置互训, 《广雅》就将“邮”、“置”均释为“驿”, 并被学者广泛征引。如《史记》卷10《孝文本纪》“余皆以给传置”句, 司马贞《索隐》引《广雅》云:“置, 驿也”;《后汉书》卷68《郭太传》及卷54《杨震传》注云:“《广雅》曰:‘邮, 驿也。’置亦驿也。”颜师古也说:“邮, 行书之舍, 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①后来, 人们还将道路沿线各种供人止宿歇息之所统称为驿, 或将邮、驿连称代指驿及与其相关的事务。但是, 秦汉的驿与邮、亭、置等机构是不同的, 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其中, 驿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传递公文、运送官物和为公务往来者提供车马等方面。

一、投递公文和运送物资

驿的产生, 源于人们对信息传递“早达”和“速到”的需求。^②《诗经·大雅·常武》“徐方绎骚”句, 孔颖达疏云:“‘绎’当作‘驿’……徐国传遽之驿见之, 知王兵必克, 驰走以相恐动。”^③说明早在先秦时期, 就已设立了驿。及至秦汉时期, 驿的设置已很普遍。据《后汉书》卷45《袁安传》载:“袁安初为县功曹, 奉檄诣从事, 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 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足见汉代一般的“公事”往来是由邮驿系统承担的。这种“公事”涉及人员往来、信息传递和物资运送等诸多方面。其中, 由驿传递信息又可分为间

接服务和直接递送两类。所谓直接递送, 是指由驿的吏员亲自投递公文; 而间接服务则是由发文者派专使递送而驿为其提供车辆和马匹等便利。

(一) 递送公文

关于驿直接传递官府公文, 在各类文献材料中非常少见。但在敦煌、居延等地所出简牍材料中, 却有大量驿卒、驿徒递送公文的记录。如下简:

简1. 东第一封囊, 驿马行。西界封书张史印, 十二月廿七日甲子, 昼漏上水十五刻起, 徒商名。永初元年十二月廿七日, 夜参下铺分尽时, 县泉驿徒吾就付万年驿。(A)

十二月廿七日夜参下铺分尽时(B)

X一〇六^④

简2. 入东军书一封。皂缯纬, 完, 平望候上王路四门。始建国二年九月戊子, 日蚤食时, 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阳(A)戊子日蚤食(B)

X一〇八

简3. 皇帝囊书一封, 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 县泉驿骑传受万年驿骑广宗, 到夜少半时付平望驿骑(A)四(B)

X一一〇

简4. 入上书一封, 车师已校、伊循田臣彊。九月辛亥日下铺时, 临泉驿汉受平望马益。

X一六一

简5. 上书二封, 其一封长罗侯, 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驿骑当富, 县泉驿

收稿日期: 2008-10-13

作者简介: 高荣(1966—), 男, 甘肃高台人, 河西学院历史系教授,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站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

骑朱定付万年驿骑。

X 一九三

以上五简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均为经由悬泉驿传递的文书受付记录。其中简3是皇帝颁赐给敦煌太守的诏令文书，该文书自东向西自万年驿经悬泉驿、平望驿，送至敦煌太守府；1、2、4、5各简所记则为自西向东传递的文书，其中4、5二简分别是屯戍西域的车师己校、伊循田官和长罗侯及乌孙公主给西汉朝廷的文书，其传递路线为平望-悬泉（临泉）-万年。若仅就此五简的内容来看，从敦煌太守府向东，似乎形成了平望驿-悬泉驿-万年驿和平望驿-临泉驿（亭）-万年驿两条文书传递路线。但是，由于此五简均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其所记载应是悬泉置所辖各驿（亭）的文书受付记录；而且，这些文书均经过悬泉置。悬泉置地处于干旱少雨的戈壁腹地，远离居民点，在这种严酷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显然不可能另外开辟一条绕过悬泉置而向东西延伸的交通线。因此，颇疑2、4两简中的“临泉”为“县（悬）泉”之误，或者就是“县（悬）泉”的别名。果如此，汉代内地与敦煌、西域间的文书往来就是通过万年驿-悬泉驿-平望驿一线而进行的。此外，在居延汉简中也有类似的公文递送记录：

简6. 入北第一橐书一封，居延丞印，十二月廿六日日食一分受武彊驿卒冯斗，即弛刑张东行

E.P.T49:28^⑤

简7. □分万年驿卒徐讼行，封橐一封，诣大将军，合檄一封付武彊驿卒，无印

E.P.T49:29

简8. 正月廿五日参舖时受万年驿卒徐讼，合二封，武彊驿佐怜惜

E.P.T49:45A

手书大将军檄

E.P.T49:45B

简9. □大将军印章，诣中郎将，驿马行，十二月廿二日起麟得，永元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庚辰食时

E.P.T49:11 + 41A

年燧长育受武彊驿卒□□封完，路□一随

E.P.T49:11 + 41B

简10. 建昭四年四月辛巳朔庚戌，不侵候长齐敢言之，官移府所移邮书课举曰：各推辟部中，牒别言，会月廿七日·谨推辟案过书刺，正月乙亥人定七分不侵卒武受万年卒盖，夜大半三分付当曲卒山，鸡鸣五分付居延收降亭卒世

E.P.T52:83

此五简出土于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遗址。6、7、

8、9四简为驿在传递公文过程中的文书受付记录，内容涉及文书的传递方向和数量、发文者、文书收发时间和地点、文书交接时间和经手人、传递者及印章是否完好等诸多方面；简10则是不侵候长齐根据候官转发的都尉府文件精神，对正月乙亥日由万年经不侵、当曲送达收降亭驿的公文传递记录进行核实查验的文书。其中的驿卒、驿佐与前五简中的驿徒、驿骑一样，都是在该驿供职和服役的吏员（戍卒和刑徒），他们都直接参与了相关的公文传递工作，足见驿确有传递公文之责。其中2、3、5简中均有驿骑，而6、7、8、9四简或为同一册书，该文书采用“驿马行”的传递方式，说明各驿都备有马匹。虽然在悬泉和居延汉简中均有“万年驿”之名，但从简文来看却各有所指，显然不是同一地名，只是异地同名而已。据6—10简，由驻于麟得的大将军府发出的文书经武彊驿卒转交万年（驿）燧长，则武彊驿位于万年驿之南，万年驿应在甲渠候官附近。由万年驿北上，可与甲渠候官辖区的主干邮路不侵—当曲—居延收降一线相连。^⑥由此可见，汉代的驿在保证政令畅通和边地军情递送，沟通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间的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运送各地向朝廷贡献的方物

《后汉书》卷4《和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云：“（临武）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据《和帝纪》本文，以驿马运送龙眼、荔枝等物，并非临时制定的新规，而是南海郡旧例。参以汉高祖令驿为其宠姬戚夫人运送洋川米至长安的事例^⑦来看，各地贡献方物均以驿递送，而此旧制或即始于汉高祖。

需要说明的是，秦末汉初以来，由于战事连绵，马匹奇缺；汉武帝以后，虽然马匹数量有了很大增长，但因不断对匈奴和西域用兵，战马耗减极大，驿马依然缺乏。以致在西汉昭、宣以前，驿政几尽瘫痪，故西汉时各地贡物大都是由邮递送的；直到东汉时，驿才再度复兴起来，并成为传递诏令等重要公文和边情急报及贡献方物的主要手段。^⑧对此将另文讨论，兹不赘述。

二、为公务往来者提供车马

（一）皇帝特派专使的出行

《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上》注引《汉制度》载，皇帝之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诫敕四种。下达诸侯王及罢免三公者为策书；制书乃“帝者制度之命”，经三公下达州郡；诏书是按惯例诏告某官的文书；诫敕是下达刺史、太守之书。张家山

汉简《行书律》规定,皇帝制书及一些紧急而重要的文书用邮传递。但在很多时候,皇帝给某个官员的书信或口谕往往是由特派专使乘驿车或驿马送达的,驿则负有为这些衔命专使提供交通便利的责任。这类专使又可分为如下几种:

1. 派往侯国谕政、慰问的使者《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咨问。苍悉心以对,皆见纳用……苍还国,疾病,帝驰遣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汉章帝向东平王咨询“疑政”可能只是托辞,最主要的是一种礼仪,显示“尊重恩礼”之意。担当此任者自然是身居高位且颇有威望的大臣,而绝非一般驿吏所能为。因此文中的“驿使”应是指皇帝的特使,因其乘驿的车辆或马匹出行,故称“驿使”。后来在东平王病重期间,汉章帝又派名医诊治,小黄门“侍疾”,而且“驿马千里”,“使者冠盖不绝于道。”也说明文中的“驿使”即指此类由皇帝派出的“使者”。有时也以“乘驿”或“驿马”代指驿使。据《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传》之“齐武王縯传附子北海靖王兴传”载,北海靖王兴深得汉明帝器重,“每有异政,辄乘驿问焉。”兴立三十九年而死,其子睦嗣,是为敬王。“睦能属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同书卷42《东海恭王强传》又载:“永平元年,强病,显宗遣中常侍钩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这里的“乘驿”和“驿马”,均指皇帝派出的使者乘用驿车马而言。

2. 因紧急要务召见朝廷重臣而特派的使者《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景初三年(239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司马懿)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即日,帝崩于嘉福殿。”魏明帝临终召见司马懿,并嘱以后事,事关朝廷大政。所谓“驿马召到”,是指派使乘驿马传达明帝旨意,令其立刻赶到。无独有偶,曹操临终召见其子曹彰,也同样采用“驿召”的方式。^⑤由此亦可见驿确用于承担紧急要务。

3. 派往地方的专使《后汉书》卷82《方术传上·李南传》载,和帝永元中,丹阳太守马陵“坐盗贼事被征,当诣廷尉,吏民不宁,南特通谒贺……至晡,乃有驿使赍诏书原停棧事。”此为汉和帝宽宥马陵所“坐盗贼事”而派“驿使”直接下达丹阳的特别诏书。同书卷65《段颍传》又载,汉桓帝时,因鲜卑犯塞,辽东属国都尉段颍“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颍,颍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

虏以为信然,乃入追颍。颍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坐诈玺书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段颍为伏击鲜卑,诈称驿骑带来了朝廷召其回师的玺书,虽然大获全胜,但却“坐诈玺书伏重刑”。值得注意的是,“原停棧事”的诏书和段颍所“诈赍玺书”,都是由“驿使”或“驿骑”递送,参以汉简中以“驿骑行诏书”之例(E.P.F22:64A, E.P.F22:69)和《后汉书》卷120《舆服志下》“黄赤绶”条注引《汉旧仪》“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之说,足证朝廷玺书特遣“驿使”、“驿骑”递送已成惯例。

《后汉书》卷57《栾巴传》注引《神仙传》又载,汉顺帝末年,“巴为尚书,正朝大会,巴独后到,又饮酒西南嚬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诏问巴,巴顿首谢曰:‘臣本县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为雨以灭火。臣不敢不敬。’诏即以驿书问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时有雨从东北来,火乃息,雨皆酒臭。’”栾巴朝会迟到,行为又有失恭敬,遂为有司所奏劾。因朝野上下盛传“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其本人又将在朝堂之上的诡异行为说成是为成都灭火,顺帝为验证其是否真有“道术”,乃下诏“以驿书问成都”。类似的事例也见于碑刻,如河南省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肥致墓碑文记:“以十一月中旬,上思生葵,君却入室,须臾之顷,抱两束葵出,上问:‘君于何所得之?’对曰:‘从蜀郡太守取之。’即驿马问郡,郡上报曰:‘以十一月五日平旦,赤车使者来,发生葵两束。’”^⑥以前述“驿使”、“驿马”、“驿召”等例之,此“驿书问成都”、“驿马问郡”当非一般由驿传递的文书,而是朝廷专使乘驿递送的诏书。

(二) 奉旨到前线赴任的将领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载,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中郎将耿舒在给其兄好畴侯弇的信中,曾谈及在进击五溪蛮的决策中,伏波将军马援拒绝先取充道而被困壶头,以致“士卒多疫死”之事。耿弇遂将此信上奏光武帝,“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同书卷65《段颍传》载,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西羌各部先后进攻陇西、金城、上郡和武威、张掖、酒泉等郡,“寇势转盛,凉州几亡。冬,复以颍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不论是派虎贲中郎将梁松到平叛前线责问马援并代监军,还是任命段颍为护羌校尉,都不是一般的例行公事,而是在形势极其严峻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非常决断。前者在马援平五溪蛮叛乱失利之后,后者则是羌部势力日盛、“凉州几亡”之时。他们均“乘驿之职”,当与其肩负的非常紧急而重要的使命有关。此二例前后相隔100多年,似乎表

明东汉时期紧急赴任的将领均“乘驿之职”。

（三）向朝廷奏报紧急军情的边将

边地将吏派驿使奏报紧急军情，在汉简和史籍中屡见不鲜。敦煌汉简中就有天凤四年（公元17年）奉命出征的“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何封等将领向朝廷“因驿骑奉”书（138）、“因驿骑遣状”（424），以求援兵的记载。^①《汉书》卷70《陈汤传》所载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亦属此类。同书卷54《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自请以五千步卒北击匈奴，武帝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颜师古注云：“骑置，谓驿骑也。”汉宣帝时，“习知边塞发犇命警备事”的丞相驭吏，“见驿骑持赤白囊”，即知为边郡“犇命书”。可见由“驿骑”传递边地急报已成惯例，而且直到三国时仍在沿用。据《三国志》卷27《王基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载，景元二年（公元261年），襄阳太守胡烈上表称，东吴邓由等欲来归降，魏元帝乃诏令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王基分部接应。“基疑贼诈降，诱致官兵，驰驿止文王，说由等可疑之状。”（本传作“基疑其诈，驰驿陈状。”）王基身为边防前线主帅，熟知当地山川险易和敌我形势，而调遣军队、改变布防形势则事关大局，稍有不慎就会“伤损威重”，于是“驰驿陈状”。反映出重要而急迫的边情军报是由快捷便利的驿负责递送的。有时频繁的驿书往来甚至会使人心中浮动，如曹魏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的陈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②就是例证。

（四）上奏紧急要务的州郡长吏

《后汉书》卷59《张衡传》载，阳嘉元年（132年），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尝一龙发机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此为郡府向朝廷奏报灾害情况。《后汉书》卷29《鄧寿传》载，鄧寿为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此为刺史监察所部，以“驿骑”奏劾诸侯王、相。同书卷82上《谢夷吾传》载，会稽督邮谢夷吾奉太守第五伦之命，前去缉拿犯有受贿罪的乌程县长，但他到该县后，只是“望閤伏哭而还”。他向第五伦报告说，经私下占候，乌程长短则一月，

长不过六十日，必死无疑，故无需缉拿用刑。“至月余，果有驿马赍长印绶，上言暴卒。”姑不论谢夷吾的占候术是否可信，但一县之长“暴卒”，显然是非常事件，故须立即向郡府奏报。县廷以“驿马”上其印绶，也是为了“早达”和“速到”！《后汉书》卷73《刘虞公孙瓒传》又载，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诏令辽东属国都尉公孙瓒讨乌桓，受幽州牧刘虞节度。刘虞主张以恩信招降，公孙瓒则欲以武力剿灭，并“数抄夺之”，刘虞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其时汉朝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局势，故只能“依违而已”。而刘虞“遣驿使”向朝廷奏报，也不过是沿用旧例，为自己获取名声罢了。

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诏遣素有威名的侍中周举、杜乔等八使分行天下，“巡行风俗”，“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③州刺史、郡督邮行部“观览民俗”，乃汉朝制度。朝廷另派使者巡行则为特例，故特别下诏，令其对州刺史及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和县令长等墨绶长吏的善恶能否进行监察荐举，其中对“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实际上也是比照边将和州郡长吏向朝廷上奏紧急要务的旧例。

（五）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和其他政权往来

《后汉书》卷84《列女传》载，屯田都尉董祀犯法当死，其妻蔡文姬请求曹操宽恕，“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同书卷85《东夷传》又云：“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可见所谓“远方使驿”，即自远国乘驿而来的使者。

汉朝与其境内的西羌、鲜卑等部及其周边的匈奴和西域诸国之间，多有驿使往来。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在给匈奴北单于的信中说：“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至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④当时北匈奴与汉朝为“敌国”，是否派遣驿使须由朝廷决定。“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就是授予武威太守孟云代表朝廷“遣驿使”的全权。与其他“蛮夷诸部”的往来，也都如此。如建武九年（公元33年），根据司徒掾班彪建议，光武帝恢复了设在凉州的护羌校尉，使“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

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戒备。”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新任护羌校尉聂尚“见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其继任者贯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⑮护羌校尉秩比二千石,专理羌族事务,他向诸部“遣驿使”,在于其“持节领护”,故可代表朝廷。前述武威太守,虽秩次高于护羌校尉,但因其无节,故须特别下诏授权。

(六) 皇帝出巡在外,朝臣紧急奏报亦遣驿使

《后汉书》卷44《张禹传》载,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汉和帝南巡祠园庙,张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洛阳。“闻车驾当进幸江陵,以为不宜冒险远,驿马上谏。”汉简中屡见“上言便事书”(387.12, 526.17, E.P.T52: 46),史籍则多称为“变告”、“上变事”等。^⑯据《汉书》卷34《韩信传》颜师古注云:“凡言变告者,谓告非常之事。”《周礼·夏官·太仆》:“掌正王之服位……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郑注云:“穷谓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令闻此鼓声,以达于王,若今时上变事击鼓矣。遽,传也。若今时驿马军书当急闻者,亦击此鼓。”^⑰可见,变事是指危害程度较严重的紧急事件,故可直诉朝廷,不必逐级传递。^⑱张禹上书,意欲劝阻和帝继续南下江陵,故必须赶在和帝启程之前送达,才有可能。其以“驿马上谏”,亦属紧急事件。只是一般的紧急文书多指各地上呈京城或由朝廷下达地方者,《张禹传》所记因和帝出巡在外,故由京城直达皇帝行在所。

三、结语

不论是公文传递、人员往来,还是贡献方物,都是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重要内容。虽然这些事务并不完全是通过驿的活动而实现的;但驿政所及,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交通等王朝统治的各个方面,以致有人将邮驿比作“国之血脉”。从某种意义上说,驿政兴废关乎王朝的政令畅通和统治的稳定与否。秦汉王朝疆域范围空前辽阔,不仅使“海内为郡县”,而且“政令由一统”,中央政令无远弗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固然与其一系列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密切相关,但发达的交通和完善的邮驿系统则是保证其政令畅通的基础。秦汉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邮驿事务,并将其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的重要依据,原因也正在于此。

注:

①《汉书》卷83《薛宣传》注引。

②郝懿行《尔雅义疏》上之二《释言》(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版)云:“传之为言转也,以车展转而期于早达也;遽之为言急也,以马急促而期于速到也。后世驿传起于此矣。”

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6页。

④见胡平生,张德芳编著《敦煌悬泉汉简释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凡出该书简文,均在书中序号前加X表示,不另注。

⑤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凡此种简号者,均出该书,不另注。

⑥参阅高荣《甲渠候官邮程考》,载甘肃省历史学会、张掖地区史志学会编《史学论丛》第9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⑦据《水经注》引《汉中记》载,汉高祖宠姬戚夫人生于汉中洋川,因其“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帝为驿致长安,蠲复其乡,更名曰县。”参见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卷27《沔水》,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⑧史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后,就在上林苑中修建了以荔枝命名的扶荔宫,又从交趾移植了大量龙眼、荔枝、槟榔、橄榄等“奇草异木”,但多未成活;偶有成活者,也不结果实。于是就从当地“岁贡”这些物产,以致“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直到汉安帝时,因交趾郡守(谢承《后汉书》作“临武长”)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参阅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3《甘泉宫·扶荔宫》,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209页。)可见,用驿马运送贡物应是东汉建立以后的事。

⑨《三国志》卷19《任城威王彰传》:“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曹操虽无皇帝之名,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握有皇帝号令诸侯百官之权。

⑩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

⑪参阅《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三《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02-624。

⑫参阅《三国志》卷22《陈泰传》。

⑬参阅《后汉书》卷61《周举传》。

⑭《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⑮参阅《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⑯参阅《史记》卷8《高祖本纪》、《汉书》卷34《韩信传》等。

⑰孙诒让《周礼正义》卷28“夏官太仆”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99页。

⑱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责任编辑:朱耀善]